

总主编 钱理群
本卷主编 钱理群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

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

这是一部探索性、区别于现有文学史、有特定角度、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有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同时，它也必然是有局限甚至是有遮蔽的。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有缺憾的价值”。它是现有文学史的一个补充，是另一种展现其丰富性和叙述的多种可能性的方式。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总主编
本卷主编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

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 . 1915—1927 / 钱理群主编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

ISBN 978-7-301-21806-8

I. ①中… II. ①钱…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1915—1927

IV. ①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4374 号

书 名：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 (1915—1927)

著作责任者：钱理群 主编

责任编辑：艾 英 徐丹丽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1806-8/I·256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46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mm×1020mm 16 开本 40.75 印张 650 千字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 总序 |

钱理群

这是一部探索性、区别于现有文学史，有特定角度、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有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同时，它也必然是有局限甚至是有遮蔽的。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有缺憾的价值”。它是现有文学史的一个补充，是另一种展现其丰富性和叙述的多种可能性的方式。我们的预期读者是已经初步具有相关文学史知识的青年学生、研究生、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我们不担负普及、传授现代文学史知识的任务。

提出编写探索性文学史的任务，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学术背景与考虑：

其一，学科的发展呼唤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文学史著作的写作，从来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近年来，有关会议开了不少，提出了各种设想，具体实践并不多；专著更出了不少，但大都陈陈相因，重复劳动的多。真正有独创性的著作是有的，2009年、2010年先后出版的吴福辉先生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是两部既集大成又有新开拓的大作。这其实是多年积累的结果。但就整体而言，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当下状态却不能不令人忧虑：表面的繁荣下面，掩盖着实质上的平庸化。因此，学科的发展，正呼唤新的想象力、新的创造力。

其二，文学和文学史观念的发展和变化，要求对现有的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有新的突破。

应该说，这些年来，我们对“文学”与“文学史”以及“现代文学”的理解，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并形成了新的研究思路，即在原始史料的重新开掘

的基础上，把现代文学的文本还原到历史中，还原到书写、发表、传播、结集、出版、典藏、整理的不断变动的过程中，去把握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历史性及其与时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复杂关系。事实上这些方面已经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成果，并揭示出一个更为阔大、丰富与复杂的文学史图景。而这样一个将文学生产与流通融贯为一体，注重文学市场作用，注重文学个人创作与社会文化关系的文学史图景，是更能显示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相区别的新的文学风貌的，但却是现在通行的文学史结构、叙述模式所难以容纳的。这样的文学史研究与书写中的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要求在文学史写作形式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创造新的结构方式、新的叙述方式；形式的突破，也必然带来对现代文学史图景的新的开掘与认识，创造出新的研究模式。

其三，对当下中国学术研究危机的大焦虑、大关怀，要求以研究的实绩作学术的坚守。

当下中国学术研究的危机，是有着深刻的体制与社会的原因的。作为个人，要改变这一状况，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从我做起”，或者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做一些我们自己愿意做的研究工作。所谓“志同道合”，除了专业研究的共同兴趣之外，最主要的，一是多少怀有文学理想主义、学术献身精神，二是拒绝浮躁与诱惑，能够坐下来，老老实实做学问。这样的聚合，既可以相濡以沫，又可以实实在在地做一些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实事，以研究实绩来坚守我们所信奉的学术精神、态度和学风。我们并不奢望影响学界，但“坚守”即是对某种我们不以为然的潮流、风气的抵抗，本身是自有其意义的。

具体地说，我们要在这部探索性的文学史里，进行三个方面的尝试。

第一，“以文学广告为中心”。

我们所说的“文学广告”，包括具有文学史价值与影响的重要的文学作品广告，翻译作品广告，文学评论、研究著作广告，文学期刊广告，文学社团广告，戏剧、电影演出广告，文学活动广告及其他。同时，我们所说的“文学广告”，又包括具有广告性质的发刊词、宣言、编后记、文坛消息、公开发表的通信……选择狭义和广义的文学广告，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材料，是因为文学广告本身就是历史的原始资料，它的汇集具有史料长编的意义。而史料长编式

的文学史结构方式，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追求（从朱自清到茅盾），也为这些年我们设想的“接近文学原生形态的文学史结构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文学广告又是文学生产与文学流通的交汇点。它有四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显示作者、译者或者出版者的写作、翻译、出版过程与意图，进而显示一定的文学发展趋向。二是显示最初的接受，不仅表现了作者，特别是出版者对读者接受的一种预期与引导，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文学广告又是简短的书评，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读者的最初接受和市场状况。三是有的广告还提供了文坛活动、文学创作、作家个人的许多信息，可以引出文学背后的故事，揭示一些文学事件。四是文学广告也是一种文体，还会涉及装帧、印制诸多侧面，本身就具有文体史、文化史上的意义。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更能体现“文学生产与流通一体化”的文学史观念。

从广告出发，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关注文学的生产与流通，还关注文学创作的语境和接受，关注广告所揭示的典型文学现象，关注广告背后的文化活动、文学事件、文人生活和交往，包括文人之死……这些都是以往的文学史不涉及，也很难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却恰恰成为我们的最大特点，并会有自己的独立发现。在这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展开空间的。

从广告出发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对文学广告这样一个现代文学所特有的文学、文化现象的特殊关注。有关文学广告的产生、发展、形式、广告语言、有关论争，以及相关的稿费问题、盗版问题、营销策略问题等等，在我们的文学史里都会有所反映。这也会大大丰富我们所描述的文学史图景。

第二，“编年史”的体例。

完全按自然时间排列，就可以避免将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纳入某一观念，进行有序化处理所带来的一些弊端。特别是将新文学作家和通俗作家，有不同思想、艺术追求的社团、刊物、流派、作家、作品……都置于同一历史时间和空间里，就可以从根本上消解文学史的等级叙述和判断，从而更接近文学发展纷乱、缠绕的无序化的原初形态。

当然，这样的编排也会有过于繁杂、读者阅读时不得要领的问题。我们采取的弥补办法，是在每一分卷前设一“前言”，对每一个十年的文学现象，作一个简要的梳理，并期待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做出不同于现有历史叙述的新的概括和体认。更重要的是，全书条目的选择与叙述，都暗含着我们对现代文学

发展的一些基本关系的持续关注，如文学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关系，文学与出版、教育、学术……的关联，中外文化的交流，文学内部语言、文体、题材、流派、风格……的发展，等等，都形成了我们的历史叙述中的内在线索，看似散漫无序、时断时续，但有心的读者是不难看出其间的蛛丝马迹的。对这些内在线索，在某些关节点上，我们也会做出分析与说明；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写而不点破，这或许正可以为读者留下想象和思考的空间。

第三，“书话体”的叙述文体。

文学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书话；用书话体来讲文学广告，是顺理成章的。书话是一种更为自由的文体：可以以文学广告为由头，写广告有关的背景，即广告背后的故事；也可以“以小见大”，抓住一点，发挥出去，讲一段历史，一个或几个文学史典型现象或问题；还可以对广告文本进行分析和评论。一切本着“有话即长，少话即短”的原则，任意抒写。

当然，作为文学史里的书话，它是有两个基本要求的：一是以叙述为主，特别注重典型细节的描述；同时又要有文学史的眼光与判断，有一定的深度，即将叙述与思辨结合起来、史料与史识结合起来，熔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炉，有情，有理，有味，这样就可以摆脱严肃、死板，让人望而生畏的“文学史面孔”，至少具有可读性，让读者有亲切感。

书话体还要展示个性。本书是一次集体写作，我们一开始就明确：写法有大体的一致就可以，不必完全统一。文风更可以百花齐放，或幽默，或简洁，或严谨，或潇洒，各人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不要勉强束缚自己。全书要展现整体的风貌；各人写的解说又各自署名，各有个性，这可能也是一个特色。

不难看出，以上三个方面具有可操作性的尝试背后，是有我们自己的文学史观作为支撑的。除了前面已经谈到的“将文学生产与流通融为一体的文学史观”、“接近文学原生形态的文学史追求”以外，还有两个重要方面。

首先是“大文学史”的观念和眼光：不仅关注文学本身，也关注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现代出版市场、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与艺术（音乐、美术、电影……）之间的关系，等等。

其二是“生命史学”的观照。在我们看来，文学史的核心是参与文学创造和文学活动的“人”，而且是人的“个体生命”。因此，“个人文学生命史”应该

是文学史的主体，某种程度上文学史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文学生命的故事连缀而成的。文学史就是讲故事，而且是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故事。所谓“个人生命体温”是指在文学场域里人的思想情感、生命感受与体验，具有个体生命的特殊性、偶然性甚至神秘性，而且是体现在许多具体可触可感的细节中的。而所谓文学场域，也是生命场域，是作者、译者和读者、编辑、出版者、批评家……之间生命的互动，正是这些参与者个体生命的互动，构成了文学生命以至时代生命的流动。这里强调的几个要素——生命场域、细节、个体性，都是文学性的根本；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用文学的方式去书写文学史，写有着浓郁的生命气息、活生生的文学故事，而与当下盛行的知识化与技术化、理论先行的文学史区别开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说，都是我们的主观追求，它的现实实现必然和预期的目标存在距离。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追求的“特色”本身，也就包含了“局限”。即以“以文学广告为中心”而言，它在提供特殊的观照视角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先天的缺憾：有些文学现象（甚至是重要的文学现象）是文学广告视野之外的，我们无法涵盖；文学广告的不平衡，也可能带来叙述的不平衡；广告词本身的商业性，有时也会形成某种遮蔽，等等。再加上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尽管我们以极大努力去查阅原始资料，搜寻文学广告，但功夫依然下得不够，多有遗漏，而且还有出现差错的可能。集体写作方式本身也会产生不平衡、不和谐现象。因此，我们一开始就确定以“发挥特色，承认局限”为编写工作的原则，提出应始终贯彻自我质疑、自我限定的精神，以保持学术的清醒，并以此为本书编写的又一个特色：这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它期待专家和读者的批评、质疑。

2012年9月25日

| 前言 |

钱理群

本卷叙述的是文学史教科书里所说的“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但这却是一个“混沌的开始”。不妨把这段现代文学史看作是一辆“时代的列车”，人们从不同的门口进入，就会有许多的“开始”、许多的“故事”。因此，本卷对这段文学史的观照与讨论，在历史叙述的层面，就会更注意文学运动和创造中的“个体史”，正是不同个体带着不同的资源、经验、体验、追求、想象，在启蒙主义的时代召唤下，纷纷登车亮相，按照自身的思想、文学逻辑，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相互对话，形成众声喧哗的舞台，最后以合力作用影响历史的发展，并在这发展中打上个人的烙印。因此，在历史叙述层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讲述这一个个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故事，呈现具体可触可感的历史场景、细节，其间有丰富的人与人的生命互动与复杂关系：交集，包容，对抗，互换，相互补充与制约，也就酝酿着此后分化中的各自释放，走向更多的岔路，开拓更大的空间，进而开始下一个更加眼花缭乱的历史故事。^①

首先自然是陈独秀的故事：他带着袁世凯复辟、二次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从政治革命转向思想革命，从庙堂走向民间，依靠“以杂志为中心”的知识群体，于1915年9月15日创办《青年杂志》，开创了一个思想启蒙的新时代，并以“老革命党人”的姿态，以不容讨论的决断态度，以群众运动之法，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动新文化运动。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请陈独秀就任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迁往北京（1917年），由此而形成

^① 此段分析，可参看王风：《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与周氏兄弟路线——兼论“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概念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同时吸取了黄子平先生的意见，特此致谢。

“一校一刊”的格局。与此同时，从《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1916年9月1日）开始，就有胡适的加入。他另有自己的开端故事：与梅光迪等在美国绮色佳小城湖畔的著名辩论之后，他带着以大学作为“文学思想之中心”的理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学工具改革的设计，以及实验主义的态度与方法，到《新青年》群体里寻求支持，进而以石破天惊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一文，开启了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突破口的文学革命运动。胡适的登高一呼，得到了被视为“古文大家”的钱玄同和原属鸳鸯蝴蝶派的刘半农的响应，两人由“复古”转向“反复古”，反戈一击，因而格外激烈。最后，又由钱玄同的动员、张勋复辟事件的刺激——这里也有一个在绍兴会馆古槐树下的谈话的故事，鲁迅、周作人兄弟改变了原来的观望态度，加入《新青年》群体（1918年），他们不仅带来了传统文化中的魏晋资源，而且以对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关系，语言、思维、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和“既坚持启蒙又质疑启蒙”的独特姿态，大大丰富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历史内涵，更以小说、散文文体的全新创造，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接着是以李大钊为核心的《每周评论》（1918年12月）、傅斯年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新潮》（1919年1月）的出现，和《新青年》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并激发了北京大学内外的“新旧斗争”。以上诸种合力的作用，才形成了教科书里所说的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并以1920年教育部下令全国中小学教育使用白话文作为一个标志性的胜利。而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都为这段历史打上个人印记。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作为进入新文化、新文学的入口。

1919年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一方面可以视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进一步把“一校一刊”创造的新思想、新文化，扩展到各地省城、县城以至偏僻小镇，形成了遍布全国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就是1920年左右才提出的。其中更有无数的“外省文学青年”的故事。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以后，政治革命任务的突显，就促使北京大学内部教师、学生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以及《新青年》内部，都逐渐发生了分化。

1921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文学团体的出现，以及以后《小说月报》（1921）、《创造》季刊（1922）、《创造周报》（1923）、《语丝》（1924）、《现代评论》（1924）、《创造月刊》（1926）的先后创刊，《戏剧》（1921）、《诗》

(1922)、《晨报副镌·诗镌》(1926)、《晨报副镌·剧刊》(1926)的出现,就标志着新文学终于从新文化运动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学运动,真正进入了新文学的创造时期。

首先是多种文学派别、知识群体的出现,形成文学发展的多元化格局。其中影响最大的即有:文学研究会派、创造社派、新月派、语丝派、现代评论派。派别的形成,不仅是文学流派的不同选择,如文学研究会倡导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新月派偏于浪漫主义,创造社对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吸取,更显示了知识分子发展道路的不同走向:《新青年》分化后,除陈独秀、李大钊走向政治革命外,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以《语丝》为阵地,继续坚持五四启蒙主义;胡适影响下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聚集于《现代评论》(在此之前还有《努力周报》和《太平洋》杂志),推动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而另一些留学英美的新月派作家则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文学范围内。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文学派别、知识群体之间的论争。和《新青年》所面对的“新旧之争”不同,此时的论争,更多的是新文化、新文学营垒内部话语权的争夺,而且每一个新派别的出现,都采取了依靠刊物,形成小圈子,向既成势力发起挑衅的姿态。当然,也有对新生力量的扶植。先后出现的湖畔社、未名社、沉钟社等,都是以外省青年为主的文学社团,得到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青年》一代人的倾力支持,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文体实验的高度自觉。新文学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文体意识的建构过程。它吸引了更多的人,带着不同的资源和梦想,通过各种途径和不同的文学社团、杂志、书局、学校的复杂关系,进入新文学殿堂。这里有:作为文学组织者的沈雁冰、郑振铎(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诗人的郭沫若(《学灯》,泰东书局,创造社)、闻一多(清华大学,新月派)、徐志摩(新月派,晨报《诗镌》副刊,新月书店)、冯至(北京大学,浅草社,沉钟社)、李金发(周作人,《语丝》),北新书局)、穆木天(创造社,《创造月刊》);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小说家的鲁迅(《晨报副镌》,《语丝》,《莽原》,北新书局)、郁达夫(创造社,《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张资平(创造社,《创造》季刊)、叶圣陶(《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许地山(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以及乡土作家许钦文、蹇先艾、王鲁彦(鲁迅,《晨报副镌》,《京报副刊》),许杰、徐玉诺、彭家煌(茅盾,

《小说月报》），冯文炳（周作人，《语丝》），台静农（未名社）；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散文家的周作人（《晨报副镌》，《语丝》，北新书局）、鲁迅（《新青年》，《语丝》，《莽原》）、朱自清（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剧作家的田汉（《少年中国》，南国社）、洪深（哈佛大学倍克教授，上海戏剧协社）、欧阳予倩（民众戏剧社）、丁西林（新月派，《现代评论》）；作为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第一代女作家的冰心（燕京大学，文学研究会，《晨报副镌》，《小说月报》）、庐隐（女子高等师范，《小说月报》）、冯沅君（女子高等师范，《创造周报》）、凌叔华（新月派，《现代评论》）等。这些新文学、新文体的创造者们，每一个人都有丰富的故事，也都可以作为进入新文学的通道。

这一时期出现的学衡派（《学衡》，东南大学，中华书局），提出了与新文学不同的文化想象与追求。通俗文学在经历了和《新青年》最初的对抗与趋新以后，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创造以正在不断发展的市民阶层为读者的市场化文学，并重新聚集在“红系列”杂志（《新声》，1921年创刊；《红杂志》，1922年；《红玫瑰》，1924年）、“紫系列”杂志（《半月》，1921年；《紫罗兰》，1925年；《紫兰花片》，1922年）和大东书局（1916年创刊，1924年扩大）、世界书局（1917年创办，1921年改组）周围，自觉进行文类细化的试验，创作了大量现代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社会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滑稽小说，并与大众媒体、大众艺术、大众电影结合，占领了市场。通俗文学和新文学形成了既对立又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其间同样有着许多故事，也是进入这一时期文学的独特通道。而曾经作为新文学对立面的旧文学的代表人物林纾、王国维的去世，也引发了人们关于新文学与中国传统关系的想象与思考。

在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以后，中经五卅运动（1925）、“三·一八惨案”（1926），无论是作为新文学创造者的作家，还是作为新文学主要接受者的青年，都出现了革命化的趋势。于是也就有了“革命文学”的最初倡导。蒋光慈的出现，创造社的转变，以及1927年作家的纷纷南下，都预示着向下一阶段文学的转化。这一时期最后出现的老舍、茅盾，也都以自己的独特故事加入新文学，并成为下一阶段文学故事的主要创造者。

从横向方面考察，也不难发现，在第一个十年里，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现代出版、现代教育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密切关系。文学与出版的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文化现象。《新青年》与群益书社，陈独秀、胡适与亚

东图书馆,《小说月报》与商务印书馆,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新潮社、语丝社与北新书局,新月派与新月书店,通俗作家与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学衡派与中华书局……的关系,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出版史最辉煌的篇章。而文学与教育的互动,更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条件和手段,并构成了本卷叙述的一条内在线索。这里有:《新青年》与北京大学“一刊一校”的合与分;文学革命与北大中文系文学教育改革的互动,包括文科研究所国文门小说科的四大演讲对新小说理论的建设、国文门《国学季刊》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推动;文学革命和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的相互促进;省市县师范学校在地方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位和作用;以及女子教育和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等等。文学与学术的互动,也最能显示新文化的特点。新青年社与科学社的相互配合,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话语与人文话语的关系,都是饶有兴味的话题。我们最感兴趣的,自然是文学革命的文学工具的改革与语言学的关系,于是,就注意到了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以来的国语运动的异与同、分离与合流,以及1925年《国语周刊》的创刊和“国语文学的再讨论”:语言问题始终是现代文学发展不可忽视的内在线索。周作人、刘半农等发起的征集歌谣运动,以及《歌谣周刊》的创办,刘半农所进行的拟民歌体方言诗创作,更是有意识地促进民俗学、方言学研究与新文学创造的互动,这都是意义深远的试验。其间的故事和风景,也足以让人流连忘返。

这一段历史的另一个重要的横向与纵向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今日欲为祖国创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以翻译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导的战略方针。这又是一个贯穿全部历史过程的基本线索。《新青年》于1918年6月推出“易卜生号”,介绍易卜生式的个性主义,本身就是思想启蒙的重大动作,同时也是对新话剧运动的一个推动。五四时期的翻译,特别关注“被损害民族文学”和“俄国文学”(见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第10号和号外),这是能够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特质的:它从一开始就定位为“世界被损害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与俄国文学有着血肉般的联系。这一时期对法国文学的重点介绍,对英国诗人拜伦、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等的着意推崇,都显示了对西方文学的独特选择。对安徒生童话的推介,更是对中

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建立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产生广泛影响的，还有几位外国学者的来华讲学。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于五四学生运动前夕（1919年4月）来到中国，英国哲学家罗素则于1920年10月来华，1921年7月他们双双离去。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北京向全国扩散的高潮时期，杜威、罗素的讲学范围也不限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还深入到了山东、湖南等省城，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24年4、5月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四十余天，此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围绕泰戈尔展开的论争，正折射出知识分子分化的严重与深刻。在1922、1923年间，居住在鲁迅、周作人家中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北大讲授世界语，虽没有那么轰动，但仍有潜移默化的效应，其所引发的周氏兄弟的强烈共鸣，尤可玩味。

| 目 录 |

总 序 钱理群 / 001

前 言 钱理群 / 001

1915 年

9 月 陈独秀开启历史新一页：《青年杂志》创刊 / 002

《青年杂志》/《新青年》上的“通信” / 008

11 月 《科学》杂志：“科学”与“人文”之间 / 013

1916 年

9 月 胡适出场：文学革命的发动 / 019

“读者论坛”里的众声喧哗 / 026

“孔子问题”讨论中的读者参与 / 029

“女子问题”的讨论 / 034

1917 年

1 月 蔡元培“三顾茅庐”：“一校一刊”格局的形成 / 041

2 月 钱玄同、刘半农反戈一击 / 046

《廿年苦节记》：通俗小说的孝道观、婚姻观和节烈观 / 051

3 月 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 / 056

4 月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旧红学”代表作 / 063

11 月 周瘦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近来译事之光” / 067

1918年

- 2月 征集歌谣运动 / 071
- 3月 周氏兄弟：《新青年》中独立、独特的存在 / 076
《傻儿游沪记》：清末民初的都市小说 / 083
- 4月 “易卜生主义”的倡导与反响 / 087
文学革命与大学文学教育改革的互动 / 093
- 6月 “新文学及中国旧戏”的讨论 / 099
- 7月 许指严的掌故小说和许啸天的宫闱小说 / 105
- 9月 新文学和教育部联手批判“黑幕小说” / 108
- 11月 《每周评论》与《新青年》、《新潮》的三足鼎立 / 112
- 12月 《新潮》杂志：五四新生代的声音 / 119

1919年

- 2月 《新潮》眼中的《新青年》 / 125
“校”与“刊”的分离 / 130
通俗文学文人的“自由谈”：小报翘楚《晶报》 / 135
- 4月 《尝试集》的问世与修订 / 139
- 5月 “北京大学丛书”：商务印书馆与北大的合作 / 146
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后续反应 / 150
- 6月 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 / 158
- 8月 郭沫若的狂飙突降 / 165
- 11月 胡适对短篇小说文体建设的贡献 / 176
- 12月 采用新标点和改良行款的艰难历程 / 180

1920年

- 1月 文学革命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的互动 / 186
- 5月 “科学与迷信”的讨论 / 191

“开新纪元”的工作：周作人的翻译 / 195

杜威、罗素来华讲学 / 201

10月 民众戏剧社：早期现代话剧运动 / 207

11月 剧作家田汉的出现 / 212

1921年

1月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 / 219

《小说月报》的革新 / 226

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的“贵真”与张恂子《红羊豪侠传》的“贵虚” / 233

3月 笑里有话：通俗文学的滑稽诗文 / 237

5月 《小说月报》中早期文学研究会小说家的创作 / 241

6月 繁星体小诗的出现 / 249

9月 创造社“异军苍头突起” / 253

10月 《诗》月刊：早期白话诗 / 263

五四时期对俄国和被损害民族文学的发现 / 269

1922年

1月 《星期》与反帝爱国小说 / 278

《学衡》重估 / 281

3月 学生戏剧与“爱美剧”运动 / 286

5月 《湖畔》、《蕙的风》：“青年人的诗” / 292

6月 整理国故思潮 / 298

8月 现代通俗文学杂志的“红色系列” / 305

大东书局、世界书局：192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的大本营 / 308

9月 创造社时期的郁达夫和张资平 / 311

10月 “哈姆雷特”和“堂吉珂德”来到中国 / 319